

# 旅沪广帮与首次官派幼童留美

林辉锋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旅沪广帮与洋务运动关系密切, 以往的研究重点考察参与创办洋务企业的情况, 而较少讨论他们与首次官派幼童留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于1872到1881年间的官派幼童留美, 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留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粤人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是旅沪广帮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旅沪广帮; 首次官派幼童留美; 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 K 256.1 [文献标识码] A

鸦片战争后, 粤商群体大规模地向海内外扩散,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势力。旅沪广帮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群体。广帮特指“广肇帮”而不是“广东帮”, 指的是晚清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 以广肇公所为核心, 由旅居上海以商人为主体的广州、肇庆籍移民组成的比较松散群体。在开埠后近半个世纪里, 旅沪广帮是上海客帮中的第一大帮, 洋务派创办的最有代表性的企业, 无不与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人及他们背后众多的广帮股东有关。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上, 已有研究重点考察他们参与创办洋务企业的情况, 无疑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但是旅沪广帮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除此之外, 还与其它洋务事业有关。

—

1872~1875年, 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由官方派出留学, 而且此次派出的幼童在人数占1872年至1894年这22年间, 清政府派往美、法、英、德等国留学生总数之60%强。<sup>[1]</sup>在参与此事的人当中, 不管是发起者、组织者, 还是所派的学生本身, 粤人都占了很大的比例。

此事, 虽然最终起决策作用的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 但最初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容闳、

丁日昌等粤籍官商。其中有纯粹为官者, 如丁日昌、陈兰彬等人; 更多的是亦官亦商者, 容闳、徐润、祁其照等都是如此。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广帮有联系, 徐润、祁其照等人更是其中的头面人物。曾国藩称, 他“在津办理洋务, 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 屡与臣商榷, 拟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 约计十余年, 业成而归。”<sup>[2]</sup>(第185页)而丁日昌之所以向曾、李提出这样的建议, 主要是受容闳的影响。<sup>[3]</sup>(第333—342页)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绩主要在于他带动了一个留学西方的浪潮。<sup>[4]</sup>(第279页)

以往学者主要关注此事的发起者、决策者, 对参与其事的其他人员则未予足够的关注。按照规定, 幼童出洋的具体操作程序是, “至挑选幼童应先在上海先行设局, 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 又挑选第三年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sup>[5]</sup>(第189页)幼童选定后, “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 在沪局肄习, 以六个月为率, 察看可以造就, 方准资送出洋。”<sup>[5]</sup>(第191页)在此过程中, 前后参与其事者多为粤人。除容闳(广东香山人)、丁日昌(广东丰顺人)外, 当时参与其事的还有如下几人, “率往者为吴川陈兰彬——后曾任使美大臣,

[收稿日期] 2004-03-11

[修回日期] 2004-08-26

[作者简介] 林辉锋(1977-), 男, 福建诏安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

前监督为高州区谔良，新会容增祥，后监督为南丰吴嘉善，”<sup>[6]</sup>（第91页）加上带领第二批幼童出洋的黄平甫、第三批的祁兆熙、第四批的祁其照，除了吴嘉善（江西人）、祁兆熙（江苏人）等，其余的大多为粤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海人祁其照，他“自同治壬申秋寄砚沪上出洋局，忝司教习，历有年所，”<sup>[7]</sup>后又带领第四批幼童出洋，并任留学事务所（驻洋肄业局）的翻译官。他在出洋途中所写的航海笔记，还在当时作为旅沪广帮舆论喉舌的《彙报》上连载过。《申报》对他和区谔良亦评价颇高，“区、祁二君，皆籍隶东粤，文章经济卓越一时。前次幼童出洋亦是祁君为之率领，兹则得任总办翻译之职，自必久于其道而诸生之获益良多矣。”<sup>[8]</sup>广帮巨商徐润在此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71年冬，他“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sup>[9]</sup>（第31页）他与参与此事的官员过往甚密，与容闳同隶籍香山，而黄平甫则是他的亲家。<sup>[9]</sup>（第35页）在他的自定年谱里，用了较大的篇幅记载了此事，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宝贵资料。后作为民国学界领袖人物的胡适受此启发，特地保留了和他同批赴美留学生的资料，也希望“为后人留作一种教育史料”。<sup>[10]</sup>（第357页）幼童在赴美途中，还受到了海外广东同乡的款待，“沿途粤东同乡款洽甚殷，礼文备至”。<sup>[11]</sup>

这些粤籍官商在此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筹备及初期阶段，从提出计划并付诸实施，到幼童们的最终成行，他们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分歧主要在此事的后期，尤其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导致留学失败的责任上。有学者认为，丁日昌赞助促成了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但他推荐陈兰彬任留学监督却导致这一计划中途夭折。<sup>[3]</sup>（第338页）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幼童留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清政府内部顽固分子阻挠的因素，也有美国政府和美国少数人的反对和阻挠的因素。<sup>[12]</sup>董守义则认为，早在规章制度建的时候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sup>[1]</sup>参与此事的粤籍官商在对西方新事物的认识上确有高下之别，容闳的目标是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者，而陈兰彬等人的目的，则仅是为了培养接受西方科技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

才。但不管如何，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都有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倾向。

1881年此次留学运动遭受挫折，幼童回国后，这件事上还可以看到不少粤人的身影。1881年夏，留美学生分3批回到上海，除了“不肯奉召，留而继学，及因故已先被开除者共11人，未归先死则有3人，归而立即隐居及自营业务者共12人”，剩下94人，十分窘困，这时徐润出面，“按各申请，贷予大洋三十至五十元，”帮他们度过难关。<sup>[13]</sup>（第50页）时在美国任领事官的黄遵宪，听到此事甚为感慨，“赋罢美国留学生一首述其事颇详。”<sup>[14]</sup>参照罗翼群文，该诗指《罢美国留学生感赋》。20年后，梁启超游美至哈佛，谈起此事仍扼腕痛惜。<sup>[13]</sup>（第471页）

## 二

对于首次官派幼童留美的研究，以往主要侧重于考察留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在讨论为什么容闳四处奔走十余年，他的教育计划却总不能实现这一问题时，有学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计划的社会历史条件，又缺乏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有力人物。具体到对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时，主要还是论述社会上层对西方观念的变化，而缺少对下层民众态度的分析。<sup>[3]</sup>（第335页）与其他洋务事业不同，派学生出洋留学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考试选拔学生，而学生则有不报考的自由。政府虽有权撤回留学生，却无法强制学生外出留学。因此前来应考的学生与留学计划的制定执行者同是此事的主动者，他们对此事所持的态度也极为重要。

可见，不仅参与其事的官商多为粤人，留美幼童主要也是粤籍子弟。在幼童的籍贯上，亲与其事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sup>[16]</sup>（第93页）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亦取此说。后来的研究者则谓，“四年共派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百分之七十是广东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毗邻澳门的香山人。”<sup>[3]</sup>（第339页）这两种说法常被引用，然都过于笼统。当时留美幼童注册时，对他们的个人资料，如姓名、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家庭

情况等均有记载;由于赴美留学在当时人眼中还是件颇具风险性的事情,因此幼童的父母甚至需要出具甘结。因此也为后人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见表1)。

表1 留美幼童籍贯构成表 (单位:人)

批次	籍贯		小计
	粤籍 (括号中为香山籍)	其他省份	
1872年第一批	24(13)	6 <sup>①</sup>	30
1873年第二批	24(12)	6	30
1874年第三批	17(6)	13	30
1875年第四批	19(9)	11	30
合计	84(40)	36	120

(资料来源:《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3-34页,第39-41页,第45-46页)

从表1可以看出,在前两批里粤籍子弟均多达80%,第三、第四批有所下降,分别为57%和63%左右。总计起来,四批总数共为120人,其中广东籍84人,占总数之70%;粤籍里面,香山籍共40人(约占广东籍的48%,占总数的1/3)。据徐润载,其他的主要来自江浙地区,两省共29人(其中江苏21人,浙江8人),占总数的24%强;余下7人分别来自山东(1人)、福建(2人)、安徽(4人)等省,所占比例不足6%。容闳所谓“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若就整体情况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至于郭文所谓其中广东人中“绝大多数是毗邻澳门的香山人”,亦不够精确。

社会风气使招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对招生结果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学者认为,“大家子弟不肯远适异国,应募者多为衣食而来,被社会视为‘漂泊无赖,荒陋不学之人’”。<sup>[17]</sup>(第45页)事实上,不排除有贫穷子弟前来应考的现象,但更多的是殷实家庭的子弟。所谓“漂泊无赖,荒陋不学之人”,更多的体现的是时人的一种偏见。部分赴美幼童是上海广东方言馆的学生。<sup>[18]</sup>(第6页)四批留美幼童里有大量洋务官员和商人的子弟,尤其是粤商子弟。第三批幼童里的祁祖彝是祁兆熙之子,祁其照之子也在留美幼童的行列。<sup>[19]</sup>而第三批幼童里的唐绍仪则是旅沪广帮富商唐廷枢的族侄,<sup>[13]</sup>(第48页)“(其)父巨川,商于沪”;<sup>[6]</sup>(第92页)容耀垣

则为容闳的堂弟。一些富家子弟没有争取到公费名额,甚至自费随同赴美肄业。第二批里,“另有粤东大户子弟七人搭附委员黄平甫带往。”到第四批时,徐润的三位堂弟“见遗于额”,只好“自备斧资”随同前往了。<sup>[9]</sup>(第41-44页)前后两批“自费生”共10人,全属粤籍子弟。故此次留学,实际上前后共有130名幼童赴美肄业。若将这部分“计划外”的学生也考虑在内的话,粤籍子弟所占的比例还要更大。当然,由于资料所限,现已很难知道这些粤籍子弟中多少人与旅沪广帮直接相关(旅沪广帮与其母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子弟不一定在上海生活,很多都留在广东),但从上述徐、唐、容等家族的情况来看,此类学生当不在少数。

对此现象容闳主要从技术性的角度进行解释,“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sup>[16]</sup>(第93页)这一解释并不全面。在上海设局招生,不仅“北人应者极少”,就是临近的江浙前来应考的子弟也不多,尤其是第一二批,粤籍子弟所占比例都多达80%。而且事实上也不完全没有报纸“传播新闻”,《申报》创办后就对此事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从这两点看,这一结果显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因素。

不同地区的民众对西方事物的接受程度迥然不同。江浙与广东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地区,留美幼童主要来自这两个地区反映了这一现实。而就民众对西方事物的接受程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广东又走在江浙前面。《申报》和《循环日报》是沪、港、粤中文报纸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两报对此事均有报道。《申报》关于此事的评论很多,其中以《论弟子出洋肄业事》一文最具代表性。《申报》主笔已经注意到“此次出洋各童类皆粤产居多,而江南绝少”这一现象,然后用大量的篇幅论述,试图打消当地民众对派送子弟出洋肄业的疑惑,认为出洋肄业“既无‘四疑’,又有‘三益’,为父母而有数子在侍者,亦可以知所以决计矣。至于归来之后,则进通衙衙门当差,讲叙得官,恩荣无比,岂不美哉?况又熟悉洋务,深知底蕴,并于技艺器具之

① 其中詹天佑祖籍安徽徽州,寄居广东省城。

间，无不知其所以然，而有以制之，则其将来诚有不可限量者，何尚限于中外之域，而存畏缩之见乎？”最后总结到，“盖此举非但有利于国，亦且有益于家，可不留意哉？”<sup>[20]</sup>《循环日报》上则很难看到此类劝说文字，只是用很短的文字报道此事，“我国出洋总办容闳已由上海至日本横滨，搭附忌列厘巴卜力火船前往美国。所有出洋肄业幼童皆遴选俊秀。闻近日读书学塾，其业精勤极有进境，而身体亦复充实，将来足备驰驱之用。闻诸廷议，以后拟遣人往英、法、普、奥诸大国肄习语言文字，各择其所长，则庶几无美不备云。”<sup>[21]</sup>从以上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两地民众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实际情况映证了这一点。1871年夏天容闳在上海没有招到足额的幼童，只好赴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sup>[16]</sup>（第93页）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情况是不断变化的，第三、四批中江浙籍的子弟所占的比例就有明显的增长。

留美幼童多为广东子弟，并非历史的偶然。由于长期广州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后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加之紧邻香港，广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人在与西方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动因是促使他们改变观念的直接因素。而随着观念的变化，他们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经济活动之中。二者互相促进。这一点从容闳身上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自述其幼年经历时说，当中国还是“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时，“而父母独命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以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sup>[16]</sup>（第1—2页）徐润在表明自己让堂弟出洋肄业的心迹时，虽然也谈“体诸钜公为国储材之远猷”，但很显然，他更加看重的是，他们学成而归后，“宾王利用，其荣名所披，固有更胜于一衿一第者。”<sup>[9]</sup>（第45页）这种直接的经济利益是促使当时粤商群体萌发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关键因素。众多粤籍子弟外出留学，实际上反映的是作为他们家长的粤商群体的意志。从这个角度看，粤商群体在这件事上起到了一种原动力的作用。旅沪广帮是晚清粤商中很

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最早与西方接触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的商界中无疑属于最易于接受西方事物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现实活动的区域——上海又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他们的思想根源、活动场所及其在上海长期占据的显赫地位，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与洋务运动发生了密切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一阶段他们与洋务派官僚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合拍，才促成了近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留学运动。

### 三

派留学生是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众多的与旅沪广帮有关的粤籍官商参与幼童留美，郝延平主要从买办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买办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他们不仅对促进通商口岸的教育感兴趣，而且还对帮助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感兴趣，进而探讨容闳和徐润在此事中的作用。<sup>[22]</sup>（第247页）相比之下，笔者更加关注他们与旅沪广帮的关系。将它放到这一背景下考察，就幼童留美本身而言，可以更加清楚其来龙去脉。就旅沪广帮研究而言，考察他们在幼童留美中的作为，可以对这一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加完整的认识。

从旅沪广帮在创办企业及留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其与洋务运动的密切关系。19世纪70~80年代，正当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许多公使出洋前路过上海，除陈兰彬、郑藻如、刘锡鸿、容闳、张荫桓等粤籍官员外，还有非粤籍的郭松焘、崇厚等，均曾以广肇公所作为自己的行辕，亦可说明旅沪广帮与洋务官僚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以唐廷枢等人进入轮船招商局为标志，旅沪广帮商人、特别是买办出身的商人走上了政治舞台。<sup>[23]</sup>（第6页）梁元生讨论了广帮买办（以唐廷枢、徐润及郑观应等人为例）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并在李的庇护下在现代化机构和官督商办企业中担任了职务”的情况，他认为“商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和影响，以代替追求单一中心（即道台位置）的控制。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象李鸿章那样强有力官员的政治庇护。这是广东帮所使用的策略。”<sup>[24]</sup>（第58页）用寻求庇护概括广帮与洋务官僚的关系并不全面，二者的结合实际上是相互利用。从

广帮角度看,参与洋务事业,既可追逐经济利润,还可以寻求政治庇护;而从洋务官僚的角度看,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所掌握的资金。1873年,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就是因为当时资金大多集中于买办商人手中,唐在集资方面具有优势。<sup>[25]</sup>(第18页)这里所说的买办商人,主要是指广帮买办商人。

旅沪广帮是近代上海规模、影响最大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从经济实务出发,萌发出学习西方的需要,这与洋务派主要从实际政务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有共同之处,因而有合作的可能。至于这两种思想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要求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是多元的,只有将它们的脉络一一理清,才能加深对某些宏观概念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丁日初认为,我国商业资本家的诞生比工业资本家早二三十年。发展了几十年的近代化商业、钱庄业的资本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sup>[26]</sup>(第34页)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洋务运动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算是封建官僚里面的开明分子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开展的一次以学习西方、发展经济为目的的自强运动,以往的研究一般只关注前者而对后者关注不够。洋务运动中封建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洋务派官僚和广帮商人之间的结合。作为晚清粤商中的一个典型群体,旅沪广帮是19世纪60~7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虽然就整个群体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已经实现了向资产阶级的过渡,但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唐廷枢等一批领军人物无疑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化。

#### [参考文献]

- [1] 董守义. 试论我国第一次赴美留学[J]. 辽宁大学学报, 1980(3): 53-58.
- [2] 曾国藩, 李鸿章. 奏选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A].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C].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3] 郭汉民. 甯昌与容闳教育计划[C]. 张磊. 甯昌研究[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4] 刘圣宜, 宋德华.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5] 李鸿章. 奏派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A].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C].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6] 罗翼群. 唐绍仪生平的概述[J]. 广东文史资料(13): 91-109.
- [7] 祁其照. 航海笔记[N]. 彙报, 1875-03-09.
- [8] 光绪元年四批出洋肄业官生姓名籍贯开列[N]. 申报, 1875-10-02.
- [9] 徐润. 徐愚斋自叙年谱[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续编第五十辑[C]. 台湾: 文海出版社.
- [10] 曹伯言. 胡适日记全编(六)[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11] 二批出洋幼童平安到埠日期[N]. 申报, 1873-07-29.
- [12] 陈国贵. 美国与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述评[J]. 西南师大学报, 1994, (4): 95-98.
- [13] 黎照寰. 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J]. 广东文史资料(19): 48-60.
- [14] 舒新城.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A].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C].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15]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及其它[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6]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7]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18] 薛理勇. 上海旧影——老学堂[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 [19] 记哈佛幼童观会事[N]. 申报, 1876-11-08.
- [20] 论弟子出洋肄业事[N]. 申报, 1872-08-16.
- [21] 中外新闻[N]. 循环日报, 1874-06-08.
- [22] 郝延平.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23] [日] 中村义. 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J].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1984(6): 1-37.
- [24] 梁元生.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J]. 上海经济科学, 1984(1): 52-58.
- [25] 夏东元. 盛宣怀传[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26] 甯初. 对外经济交往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A]. 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Guang Group in Shanghai and the First Official Dispatch of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S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N Hui-feng

(History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Guang Group in Shanghai closely related with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were mostly focused on its involvement in helping establish enterprises but hardly discussed its role in the first official dispatch of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a typical event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overseas study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Guang Grou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ent and this was a necessary part of Guang Group's involvement in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Key words:** Guang Group in Shanghai; the first official dispatch of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责任编辑 林 芑)

(上接第 97 页)

### [参考文献]

- |  |  |
|--|--|
| [1] 全唐诗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王夫之. 古诗评选 [M]. 张国星校点. 北京: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
| [2] 周振甫. 诗经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7] 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 [3] 论语 [M]. 郭竹平译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8] 金圣叹.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M]. 曹方人, 周锡山标点.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 [4] 范温. 潜溪诗眼 [A]. 郭少虞. 宋诗话辑佚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9] 谢榛. 四溟诗话 [A]. 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 [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

## On the Material for History Poem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LIU Liu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s social background, aesthetic custom and poets' state of mind,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at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declining and falling, the poets then cultivated the state of mind of disappointment, contradiction and desperation and the aesthetic custom which laid stress on tragedy, and that the material for their history poems focused on mourning, distress and introspection.

**Key words:** the late Tang Dynasty; history poems; material; tragic character

(责任编辑 林 芑)